

· 创刊 30 周年纪念 ·

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展的历程

I. 1978—1997 年工作回顾

魏承毓

【关键词】 流行病学学会;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历史回顾

Review on the history fo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 (I)

WEI Cheng-yu.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Cheng-yu, Email: wcy280124@163.com

【Key words】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Review of history

一、引言

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中华医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其正式名称为“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而此前一直是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的一个学组,由老前辈严镜清教授等负责。1987 年国内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后,原属预防医学范畴的专业学科均归属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因此流行病学学会自 1991 年 11 月以后也被批准归属于中华预防医学会,其正式名称改为“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是中华预防医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之一。随后的一年多,依据 1992 年 10 月 6 日通过的《中华预防医学分会(专业委员会)组建办法》之要求,所有原二级学会一律改称“分会”或“专业委员会”,因此流行病学学会中的“学会”二字也相应更改为“分会”,这也就是目前使用的正式名称“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由于前后不同时段中曾有过三种在文字上不完全一致的称谓,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名称均难以全面准确地表述包括各阶段历史在内的流行病学学会的整个历史,因而本文在文题中权且将其笼统地称为基本上可以涵盖三种称谓的名称“我国流行病学学会”。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写史。为了确保所写史实的精确无误,文中仅限笔者亲自参与和亲身经历的自学会成立前 1978 年 6 月至 1997 年 10 月底这 20 年前后的事,即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学术大会期间的种种史实。至于其后乃至更以后的事,自有其他亲历者撰写,且其内容必将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回首往事,当年执著于创建流行病学学会的前辈与同仁中已有不少人先后辞世并永远离开了他们

钟爱的流行病学学会。因此,追忆这段往事并把它如实写出来已是不容再等的事。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为通过历史可以镜鉴良莠,对照是非曲直,从中汲取教益。这也正是本文追述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展中这段史实的主要考虑。兹择要陈述如后。

二、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政府即提出包括“预防为主”在内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卫生防病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作为预防医学基础学科的流行病学在对这一成就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在卫生防病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1960 年布拉格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关于流行病学定义与研究范畴的热烈争论,使前苏联学派关于流行病学只限传染病范畴的传统论断受到质疑与挑战,这也促使我国业界同仁解放思想,重新考虑问题,因而对慢性非传染性及其他原因未明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也迈出了较大步伐。从此时流行病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大好形势分析,成立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不仅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也具备了应有之条件。在社会大环境方面,1976 年“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心振奋,百业待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向医学科学现代化进军》的政策性报告中,将流行病学本着“抓带头学科与抓技术关键”的原则,首次列入国家六大科技关键问题之内。

在上述相关时空背景的激励下,流行病学界同仁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大家多年翘首盼望的事只欠东风,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了。1978 年 6 月,正在天津市参加编写《流行病学》参考书的耿贯一、王慧垣、王

正伦(天津医学院)、连志浩、曹家琪(甘肃省卫生防疫站)、何尚浦、刘杏英(武汉医学院)、吴系科(安徽医学院)、魏承毓(北京医学院)、于恩庶(福建省卫生防疫站)、钱宇平(兰州医学院)及于潜(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12位同仁在学习讨论钱信忠部长报告的过程中,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以自愿签名的方式写一份题为《关于加强流行病学工作的几点建议》的正式报告,并于6月9日呈送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此报告除简述了流行病学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及与国际先进水平方面尚存的差距外,着重提出了以筹建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和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两件大事为核心内容的五条具体建议。实际上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汇集了广大同仁多年来期盼尽早落实的心愿。1979年在太原市审定《流行病学》统编教材的苏德隆、耿贯一和吴系科三人又在返回各自单位的归途中转道北京,专程拜会了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傅一诚和卫生部科教司司长陈海峰,向他们进一步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流行病学的发展动向及在我国成立流行病学学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位领导人对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当即表示理解和支持,答应一定认真研究并进一步向上反映。今天看来,1978年的书面报告和1979年的专程拜访,对其后流行病学学会的成立与顺利发展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效应。当年秋天在中国科协和卫生部的支持下,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即在北京组建了流行病学学会的筹备委员会,并于1980年6月9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80)会学字第55号文件”,正式通知拟于年内召开第一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和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

三、学会适时诞生

经过筹备委员会约半年左右的充分准备,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7月21—27日在哈尔滨市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正式与会代表195人集聚一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流行病学界的第一次空前盛会,气氛十分隆重和热烈。开幕式由苏德隆教授主持,由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施正信致开幕词。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黑龙江省政府、省科协、省卫生厅及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等部门领导及知名人士等十余位嘉宾。施副会长在开幕词中首先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成立流行病学学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提出了四点希望:①一定要把学会办成“科学家之家”;②一定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③一定要多出成果和人才,为

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④一定要当好卫生防病工作的顾问和参谋。这次会议采纳的论文共240篇,其中被推荐大会宣读31篇,分会场宣读131篇,基本代表了解放后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向和水平。报告中除何观清教授等作了有关国内外流行病学进展方面的介绍外,其余多为各病种的专题报告。有几篇此前因“保密”所限不能及时交流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特别关注,其中如:黑龙江省发现土拉菌病流行的调查报告(1959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首次流行埃尔托霍乱的报告(1964年)、海南岛水土中首次分离出鼻疽杆菌的报告(1975年)及登革热在广东佛山市的首次出现(1978年)等。苏德隆教授在总结报告中提及不恰当的所谓“保密”不利于我国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和卫生防疫事业时,还特别指出能把这些文章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亮出来,其“意义是深长的”。此外,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比例尽管仅占1/5,但说明已突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传染病”的传统观念,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其中肿瘤、心血管病、克山病、大骨节病,乃至糖尿病、精神病等内容皆有涉及,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关于克山病与肝癌病因的专题讨论,其争论之热烈,不只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而且几乎到了“面红耳赤”的程度。另外,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代表报告的全国恶性肿瘤死因调查和编制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集》同样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和欢迎。除大会与分会场进行的学术报告外,还组织了包括流行病学的发展方向、学术名词的统一、刊物出版、教学与科研、在卫生防疫实践中的作用以及需要向中国科协、卫生部及上级学会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等的专题讨论,内容相当广泛和更贴近当时的实际需求。

总之,从这次大小会议的报告和讨论内容分析,我国流行病学在解放后的30年中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研究领域日趋扩大,研究内容日益深入。从仅限研究传染性疾病发展到也研究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原因未明疾病;从一般描述性调查分析发展到定量的数据分析或实验研究;从单纯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发展到有计划的疾病监测等。此外,相关学科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为流行病学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空间。

该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成立中华医学会下属的流行病学学会。首先是依照《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进行选举。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经无记名差额选举,选出43人为第一届

委员会委员。再由全体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严镜清、苏德隆、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钱宇平、魏承毓、都康平、刘瑞璋、吴系科、何尚浦、姚凤一、白云翔、张云素、董汉臣 15 人为常委。选举苏德隆为主任委员，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为副主任委员，严镜清为顾问，魏承毓和于潜为秘书。至此，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正式宣告成立。为了其后工作的更有效开展，会议还确定成立学术、出版、科普及组织 4 个工作组，分别由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魏承毓兼任组长。本次会议自 21 日开幕至 27 日下午隆重闭幕。苏德隆主任委员在其会议总结中首先肯定了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建国 30 余年来我国流行病学事业已取得的明显进步和对国家卫生防疫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当时依然存在的差距和对今后工作的五点希望与要求：①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树立良好学风；②进一步改革流行病学教学、抓紧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③加强科学研究，密切与有关学科间的协作，尽可能采取新技术、新方法，提高科研质量；④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⑤正确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各项规定，批判并切实纠正极左路线在这一问题上的流毒和有害做法。他要求大家齐心协力，精心培育年轻的流行病学学会茁壮成长。最后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施正信致闭幕词，会议执行主席何观清宣布第一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大会胜利闭幕。

四、学会茁壮成长

1. 着手发展与健全各地组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自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后，由于国家的整体形势越来越好，必然为学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首先，在组织建设上，至 1985 年的 5 年时间内已有 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独立的流行病学会分会，有 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条件不成熟，在卫生学会内成立了流行病学学组；会员人数一般多在 100~300 人之间，最少的 50 人，最多的 600 人，为开展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学术活动方面，除派代表参加了 1983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 IEA) 地区性会议外，也曾邀请 IEA 的 Walter Howard 教授等于 1984 年访华并作学术报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会或学组也自发开展了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学术报告会、讲习班、进修班或系列讲座。在学术期刊的创建与出版方面，主要是通过协商将原属流研所的内部学术期刊《流行病学杂志》自 1981 年起改版为“中华系列”的全国性

公开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此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如组织会员为广播电台撰稿，推荐专家担任科普图书或期刊的编委或业务顾问以及开展科普咨询服务等。

2. 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明确办刊宗旨及审稿制度。已如前述，早在 1978 年 6 月由耿贯一等 12 位业界同仁呈交给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的五条建议中即着重提出了“以筹建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和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为核心内容”的两件大事，但直至学会成立后数月的 1980 年底，创办杂志的事仍无着落。随后在总会学术部的关心与提示下，由蒋豫图 (副主任委员，分管出版组) 和魏承毓 (常委兼秘书，分管组织组) 二人与流研所分管内部期刊《流行病学杂志》的所长高守一具体商讨能否将该内部刊物改版为归属中华医学会领导的“中华系列”刊物之一并公开发行之事。由于双方想法几近一致，因而迅速达成下列共识：①自 1981 年起原属流研所的内部刊物《流行病学杂志》(季刊) 更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归属中华医学会主办，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公开发行；②成立新的编委会，各编委经协商推荐后报请中华医学会正式聘任；③杂志编辑部挂靠在流研所；④编委会领导层中应有流研所相关领导人参加。在上述共识的原则下，经过一段酝酿，即按中华医学会的有关章程，组成由 40 人为编委的第一届编委会，推举其中 9 人为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是 (以姓氏笔划为序)：于潜、何观清、严镜清、苏德隆、高守一、钱宇平、耿贯一、蒋豫图、魏承毓。苏德隆任名誉总编辑，何观清任总编辑，蒋豫图、耿贯一、高守一任副总编辑，梁济民、严镜清、曹庆任顾问。随即在何观清总编辑的主持下，研究并初步确定了具体的四条办刊方针：①贯彻“预防为主”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③及时交流本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疾病防治研究的新成果与经验教训；④为不断提高业界的学术水平和培训干部队伍作出应有的贡献。关于审稿制度方面，何观清总编辑提出，先由编辑部初步“过筛”，如可用，再送两位同行专家评审，如两人意见不一致，则再送一位专家评审后，最终定夺是否交由常委会最终审定。此即所谓的“三审一定”审稿制，此制度其后一直延续多年。由于第一届编委会已为杂志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因而其后各届编委会基本上沿袭其制度或有所“微调”和新的的发展，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至于其后各届编委会的组成情况，这里只作简

介:第二届(1986—1991年)由47人组成,其中9人为常委,何观清连任总编辑(原名誉总编辑苏德隆不幸于此此前逝世,本届再未增补),蒋豫图、耿贯一、刘汉明、郑锡文任副总编辑,曹庆、汤双振任顾问。第三届(1991—1997年)由55位编委组成,其中17人为常委。何观清、蒋豫图任名誉总编辑,王钊任顾问,魏承毓任总编辑,俞顺章、郭存三、耿贯一、郑锡文、吴系科任副总编辑。第四届(1997—2002年)编委会由54人组成,其中常委18人,魏承毓连任总编辑,俞顺章、郭存三、王克安、耿贯一、郑锡文、吴系科任副总编辑。之后又相继诞生了第五届(2002—2009年)及第六届(2009—)编委会。

3. 照常举行全国学术会议和改选换届事宜。

(1)积极筹措第二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第二届委员会。原应于1985年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及换届大会,由于经费原因,决定延后至1986年7月举行。是年2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了筹委会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魏承毓、于潜、李婉先、钱宇平、刘瑞璋、何尚浦、连志浩、屠云人、李寿复、郭存三及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的张玉琴、陈熙敏和宁夏医学会的丁迎祥秘书长等共16人。本次筹委会任务:①复审全部文稿670篇,并确定大小会报告及墙展的题目;②落实10个特邀报告;③确定出版论文汇编及编辑组人员名单;④确定大会主席团组成办法及秘书长人选;⑤确定新一届委员会产生办法及有关准备事项。

1986年7月25日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第二次全国学术会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5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概况为四项:①交流1980年以来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新的重要进展;②组织专题报告和讨论;③交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流行病学分会(或学组)的建设活动情况、经验及进一步发展设想;④改选第一届委员会,成立第二届委员会。在会议后期,根据《中华医学会关于组建专科学会委员会若干问题的意见》,改选了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了由47名委员组成的第二届委员会,其中13人为常务委员。选举钱宇平为主任委员,李寿复、耿贯一、俞顺章、郭存三为副主任委员。聘请何观清为名誉主任委员,蒋豫图、都康平为名誉顾问。根据委员们的建议,决定成立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统计方法及计算机使用、流行病学教学、疾病监测及遗传流行病学等学组,并提出各学组召集人的建议名单。会议于29日闭幕。

回顾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之间的不同,主要

有几点:①与会代表357人,较上次的195人明显增多;②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667篇,较上次的240篇亦明显增加,且其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计划生育、医院管理、康复医学等内容多达150篇;③会前即成立了6人编辑组,做出编辑出版论文的计划,代表报到时人手一册,与上次仅由与会代表携带各自油印件论文临时散发的情况有明显进步;④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决定在学会内成立专题学组,较上次只有4个工作组更易推动经常性工作与学科的发展;⑤委员及常委的年龄构成相对年轻化;⑥在此期间已有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⑦1989年4月24—26日还曾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名为“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Epidemiology”的国际流行病学地区性学术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召开的、由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承办和主持的、以亚太地区为主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代表330人,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的论文约为470篇。

(2)中华医学会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主持第三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及换届大会。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第三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1991年11月3—6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与会代表共332人,提交论文总数为1027篇,安排大会报告10篇,分会场报告337篇(共设6个分会场)。开幕式于4日上午隆重举行,由第二届委员会钱宇平主任委员作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遵照医学会章程规定,会议期间进行了第二届委员会的改选换届工作,成立了由50名委员组成的第三届委员会,其中14人为常务委员。选举魏承毓为主任委员,俞顺章、郭存三、耿贯一、郑锡文为副主任委员。聘请钱宇平为名誉主任委员。至此,流行病学学会第二届委员会的改选工作顺利完成,第三届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次会议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根据“卫生部(87)卫办字第7号文件”的精神,将流行病学学会的隶属关系自1991年11月7日起改由中华预防医学会领导,成为中华预防医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仍归中华医学会领导。因此这次学术会议及换届工作是在中华医学会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领导下进行的,本届委员会认真吸取了上两届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大力推行平时以学组和地区活动为主的学术活动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活动形式既易于组织,花钱少,方便参与,又实效大。因此在已有学组基础上又增加了计划免疫学组和生殖健康与计划生

育学组。与各学组活动进行的同时,又组成以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及西南6大区为单位的地区性学术活动,并以各大区为单位选出召集人或联络员按时开展交流。至于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自范围内开展的学术活动,由于更能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需求,因而几乎每年都有,同样受到普遍欢迎。上述这种以学组和地区为单位开展学术活动的方式、方法,机动灵活,极大地弥补了按常规每5年才能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不足。例如1994年7月与1996年10月先后两次分别在北京、南京市举行的全国传染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1994年8月与1996年9月先后在甘肃省兰州市与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的全国疾病监测与控制学术会议。虽然都是学组的活动,但在这两方面学科领域中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1996年4月根据当时国内艾滋病、肝炎、血吸虫病等主要传染病及伤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及时在北京市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学术会务部联合举行了一次以国内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防疫与预防保健系统代表占大多数的“'96全国流行病学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在115名与会者中副高级职称以上者达52人之多,约占与会人数的一半。同时还出版了《'96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论文专辑》,刊出论文446篇。此外,这期间也特别加大与国际同行间的联系和交流,于1995年11月8—10日与IEA、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市联合主办了“'96上海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其后又与IEA、日本流行病学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天津分会及天津医科大学等于1997年9月16—18日在天津市联合举办了与“'96上海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同样规格的“天津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并同时举办了中日两国流行病学联合会议。除上述两次属于IEA的地区性学术会议外,1997年7月15—17日与广州医学院、美国室内空气研究中心(CIAR)及纽约医学院(NYMC)在广州市联合举办了一次名为“危险因素评价与流行病学实践国际讲习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isk Assessment and Good Epidemiological Practices),邀请中美两国学者共17人在会上作专题报告,同时编辑出版了中、英两种文本的会议论文集。这三次在我国上海、天津及广州市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及198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均有一定数量的我国流行病学同仁作学术报告或参与研讨,既达到与国际同道面对面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彼此提高

之目的,又增进了友谊与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流行病学事业繁荣与发展。

为了把学会真正办成在浓郁学术氛围中健康成长“会员之家”,及时交流学术进展,这期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也连续开辟了“现代流行病学讲习班”、“流行病学基本方法系列讲座”、“流行病学知识系列问答”及“临床流行病学讲座”等专栏,就实践中大家关心的问题讲解与讨论,其主要特点是紧密结合实际,突出重点与难点,强调学以致用,因而受到广泛欢迎。另外,学会在献言献策、当好政府防病灭病参谋及完成上级交办的临时任务方面,也尽力做了一些工作,如积极参与原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我国1991年特大水灾中如何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及“中国救灾防病对策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向卫生部教育司提交“关于加强卫生学校和护士学校流行病学教学的报告”(1992年);协助主管部门推荐“全国首届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1993年)、推荐“资深会员”(1994年)、推荐“第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5年)、推荐“吴阶平医学奖”(1996年)以及推荐提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1997年)等。

(3)携手迎接跨世纪的流行病学挑战,举办第四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1997年10月24—26日在深圳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共400余人出席了会议。这又是一次国内流行病学盛会,与会代表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共计737篇,其中安排了9个特邀报告、16个大会报告和4个分会场报告,内容包括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伤害、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流行病学教学法及预防保健等多个方面,说明我国流行病学在近几年又有较大发展。会议期间举行学会的换届选举,在53名委员中选出13人为常务委员,选举郑锡文为主任委员,郭存三、俞顺章、王钊、屠云人为副主任委员。聘请魏承毓、耿贯一为名誉主任委员。

五、结束语

笔者追述了我国流行病学学会自成立前后至1997年期间的这一段往事,且重墨描写了第一次会议期间涉及创建学会与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这两件大事的一些过程,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汇编或专辑可供后人查阅,所以哪怕是点滴资料,也弥足珍贵。但无论怎么说,由于不少当事人已先后逝世,求全仍是相当困难的。

30年往事,弹指一挥间。继1997年第四次全国

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在深圳市召开之后,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换届大会于2002年10月在杭州市如期举行,而第六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也于2009年7月在银川市召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事业始终在奔腾向前。尽管以苏德隆、何观清教授为代表的我国流行病学前辈中不少人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终生为之献身的流行病学事业却是永恒

和不朽的。后人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在他们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不断做出“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造性业绩,这也是对已先后逝世的新中国流行病学事业开拓者、流行病学学会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始人的最好怀念。

(收稿日期:2011-02-08)

(本文编辑:张林东)

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展的历程

II. 1997—2010年工作回顾

郑锡文 李立明

【关键词】 流行病学学会;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历史回顾

Review on the history fo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

(II) ZHENG Xi-wen¹, LI Li-ming². 1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G Xi-wen, Email: zhengx902@163.com; LI Li-ming, Email: lmlee@pumc.edu.cn

【Key words】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Review of history

一、引言

第四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1997年10月24—2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换届工作也同时进行。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400余人参加会议。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戴志澄、副秘书长王有森,以及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刘邹鲁等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录论文737篇,其中不但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而且还涉及健康、伤害等各个领域。新技术、新方法也不断出现。会议期间同时进行了第四届委员会的换届工作。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魏承毓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自1991年以来6年中流行病学分会组织召开的多种形式学习交流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第四届委员会共有53名委员,会议选出13名常务委员,原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锡文当选为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存三、俞顺章、王钊、屠云人为副主任委员。聘请魏承毓、耿贯一为名誉主任委员,吴系科、李婉先、陈友绩、张孔来、陈书兴、戴汉民、刘茂松、陈亢川为名誉委

员。聘请曲书泉、王岚为分会秘书。郑锡文主任委员在代表新一届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新一届委员会将进一步团结组织广大流行病学科技工作者,促进流行病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及普及推广,促进人才的成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努力为预防医学事业及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做出贡献。明确开展学术交流是学会最基本的任务,今后要积极开展各学组及地区性的学术交流工作。

本文拟就第四届委员会成立至2010年期间的工作作回顾。

二、举办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和流行病学分会换届会议

1. 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五届编委会换届会议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及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的大力支持下,于2002年10月9—1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全国2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华预防医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贺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杨子明、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兼浙江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周坤等出席会议。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郑锡文作工作报告,总结了本届委员会5年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